

余杭历史文化丛书

Yuhang Lishi Wenhua Congshu

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宣传部 主编

良渚文化

西泠印社出版社

余杭历史文化丛书

良渚文化

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宣传部编

西泠印社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良渚文化 / 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宣传部编.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7.12

(余杭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80735-289-1

I. 良... II. 中... III. 良渚文化—研究 IV. K87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2883 号

《余杭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

顾 问: 朱金坤 姜 军

主 任: 戚建国

副 主 任: 沈旭微 徐美娟

主 编: 沈旭微

副 主 编: 冯玉宝 钱利利 吴朝晖

编 委: 姜 蕴 唐鹏飞

本册撰稿: 蒋卫东 陆文宝

总 序

《余杭历史文化丛书》编就付梓，即将出版问世，这是余杭文化建设的一项成果，我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

余杭是良渚文化的发祥地、京杭运河的发端地，也是日本茶道的发源地。余杭建县已两千余年，历史悠久，文脉深厚。在这片土地上，既衍生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也孕育了一批以沈括、章太炎为代表的历史名人，还吸引了众多的雅士名流，留下了许多歌颂余杭的佳作名篇。余杭人民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创作才能，使余杭大地处处绽放出民间文化的绚丽花朵。《余杭历史文化丛书》就是这些源远流长又博大精深的人文瑰宝的真实记录。

今天，余杭人民正在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全力打造最适宜创业创新、最适宜休闲居住的美丽之洲。加强文化建设、建设和谐文化，是全区人民团结进步、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重要精神支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需要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也需要丰富健康的文化生活，满足人们精神文化日趋旺盛的迫切需要。一个地区的发展

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余杭人民正为打造文化名区，提升文明素质而共同奋斗。《余杭历史文化丛书》的出版，无疑将有力地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深融于民族的血脉之中。我们在建设和谐文化时，要十分注意弘扬历史传统文化，努力地挖掘它、宣传它、传播它、弘扬它；用优秀的历史文化精华，教育和引导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以礼敬自豪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自觉地喜爱它、传承它，借以加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并与当前蓬勃发展的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形成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生态。当前市场经济逐渐趋向成熟，地区间交往更加活跃，增进相互了解、密切相互交流，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人们在交往时，不仅要了解对方的现实状况，对其历史文化的关注程度也在提高。向外展示与传播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和精采内容，有助于提高余杭知名度，加深双方互信度，增进友谊，扩大共识，推动经济建设，这也符合今日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余杭历史文化丛书》对内是一份好教材，对外是一张金名片。我衷心希望有更多的人阅读它、喜爱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加快建设文化名区，打造最适宜居住的美丽之洲。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everal fluid, connected strokes. The signature appears to be '朱永' (Zhu Yong).

2007年12月

目 录

总 序	朱金坤
引 子	1
第一章 良渚文化的发现和命名	
第一节 施昕更与《良渚》	3
第二节 良渚文化的命名	10
第二章 认识良渚文化	
第一节 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大突破	14
第二节 认识良渚文化	25
第三章 良渚文化时期的生活与生产	
第一节 饮 食	42
第二节 穿着：服装与服饰	59
第三节 建筑与村落	74
第四节 出 行	84
第五节 丧 葬	90

第六节 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	100
第七节 良渚文化手工业生产	108
第四章 良渚文化玉器	
第一节 原料与制琢	159
第二节 器形与分类	170
第三节 “神徽”的释读	186
第四节 神圣与精致	190
第五章 文明圣地——良渚遗址	
第一节 地理概况	194
第二节 遗址分类	197
第三节 重要遗址举隅	206
第六章 遗产传承：我们的责任	
第一节 以非常的重视保护非常的遗址	238
第二节 打造和谐的遗址生存环境	246
第三节 营造和谐的遗址保护氛围	251
第四节 探索和谐的遗产利用方式	262
后 记	269

引 子

这是一方美丽的土地，长江和钱塘江共同雕琢出它 36500 平方公里的妖娆身躯，澎湃的太湖是它的核心，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河道湖荡，支撑起它生生不息的血脉，也使它饱含水的灵性。尽管在中原人撰写的史籍里，“夏少康封越，周太伯奔吴”之前，它默默无闻，连跑龙套的角色也没轮上，但七十多年来考古工作者的手铲，却不断揭开它荒草萋萋的历史尘封，使它曾经沧海桑田的厚实面庞逐渐变得亲切。经历了旧石器时代的筭路蓝缕以及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的风风雨雨后，距今 5300—4300 年前，它迎来了堪称核聚变的时代：犁耕的稻作农业，分工精细而发达的手工业，大规模营建工程，复杂的社会结构，完备的礼仪制度，以玉器、漆器、黑陶为代表的卓越的艺术成就……那燃烧在瑶山、汇观山上的圣坛之火曾令多少的朝圣者迷离？谁不羡慕这耀眼的繁华和彻夜的喧哗？就连今天严谨慎微的考古学家也抵挡不住它的诱惑，被它陶醉，为它痴狂。他们虽然仍苦恼于它物与人相生相伴真实场景的物是人非，难解究竟，但已抑制不住对它的膜拜，

他们颂扬它是世界东方明亮璀璨的明珠，他们为它戴上实证“多源一体”中华文明起源的光环。

这方美丽的土地就是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而它被考古学家命名为“良渚文化”的那段峥嵘岁月，就是它实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核聚变时代。

来吧，快来吧，让我们一起追随考古学家的手铲，穿越那隐埋了真相和情节的时空障碍，走进那曾经销声匿迹如今却又静静恭候着您的良渚文化，走进它曾经的辉煌。

第一章 良渚文化的发现和命名

第一节 施昕更与《良渚》

良渚文化是以它的最早发现地——良渚遗址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20 世纪 20 年代，以田野考古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迅即在国内掀起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先生语）的考古热潮，随着周口店、西阴村、殷墟等处考古发掘工作的先后开展，中国考古学逐渐走过了由无到有、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由少到多、考古发掘由外国学者主持到独立承担的拓荒过程。不过，当时新成立的中国考古机构的兴趣和精力几乎都集中在黄河流域，对史籍记载地处“化外之地”的江浙地区无暇顾及，于是，江浙地区古文化遗址首次发现和首度发掘的荣环便戴在了一批热衷于研究江浙古文化的非专业人士头上。

1930 年，时任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的卫聚贤主持南京栖霞山六朝墓葬的发掘，于无意间采集到石器，卫氏即已提出江南史前文化的探讨问题，但未曾引起多少注意，甚至论文在上海

竟无从发表。1934年，慎微之在浙江湖州钱山漾采集到石镞、有段石锛、石凿等文化遗物。1935年，卫聚贤与金祖同、陈志良又分别在江苏常州奄城和上海金山戚家墩发现几何印纹陶器。张天方、蒋大沂实地调查嘉兴双桥玉器群前后两次（1897年、1934年）的出土情况。

以上这些遗址的发现会同苏州、绍兴、平湖、海盐等地陆续发现和采集到的石器，引起了一批热心研究江浙古文化学者的关注。1936年2月，以卫聚贤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上海发起成立“以研究吴越（暂以江苏、浙江两省为限）史地为宗旨”的“吴越史地研究会”，8月30日，“吴越史地研究会”正式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推举蔡元培任会长，卫聚贤为总干事，提出“吴越文化”的新概念，并积极倡导“吴越文化”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由卫聚贤主编的《吴越文化论丛》更是成为发表“吴越文化”最新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阵地。1930年以来江浙地区较广阔地域内古文化遗址的发现成果以专刊或论文的形式陆续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1936年5月，杭州古荡老和山因建造杭州第一公墓，动土中陆续出土一些石器，引起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注意。经卫聚贤倡导，5月31日，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作了一天的试掘，参与试掘的有吴越史地研究会的卫聚贤、乐嗣炳、金祖同和西湖博物馆的馆长董聿茂、历史文化部主任胡行之、地质矿产组助理员施昕更等人。试掘开探坑3个，仅获石器6件、陶片3块，另采集石器10余件，这是江浙

地区第一次与良渚文化相关的田野考古发掘。当年由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编出版的《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是江浙地区的第一份考古发掘报告。

古荡的考古发掘，仅仅进行了短短的一天功夫，不料却改变了时年24岁的施昕更的命运。施昕更（1912—1939），初名兴根、鑫庚，出身于杭县良渚镇的一个店员家庭，家境贫寒，但自幼聪颖，虽仅毕业于浙江省立高级工业艺徒班，却因1929年在第一届西湖博览会上的出众表现，被西湖博



施昕更像

物馆招入地质矿产组任助理员，工作勤勉用功，先后发表《浙江地质矿产志》等多篇论文。古荡发掘时，西湖博物馆派他参与古荡发掘的原意，是让他记录地层，不过施昕更在接触出土的石器后，感到很熟悉，意识到家乡良渚镇屡有出土的石器应与古荡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基于对探究遗址的狂热兴趣，第二天，他就急急的回到故乡（良渚）去搜集。除了石铲之外，意外的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式的石器，但带着明确考古目的的施昕更“觉得以收购的方式，是太不科学化，太幼稚，还不如古董商收购古玩”。7月，他第二次再赴良渚调查，“想利用河岸池底来观察地层的剖面”，经过多日的分区考查，“对于石器遗址的分布地点，得有约略的轮廓，同时在枯竭的池底，亲自拣到的石器也不少”。11月3日，作第三次良渚之行时，施昕更先



长明桥遗址



棋盘坟遗址

生在良渚镇附近棋盘坟的一个干涸池底，偶然发现一二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受《城子崖》发掘报告启示，悟及其与山东城子崖黑陶文化为“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由董聿茂先生主持的西湖博物馆对施昕更先生的新发现

非常重视，由馆方依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古物保存法》第八条之规定，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取得采掘执照。1936年12月1—10日、26—30日，1937年3月8—20日，由施昕更先生先后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古京坟、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六处遗址进行了试掘，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并在此期间经调查，发现了以良渚镇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

有意思的是，就在施昕更闷头发掘，埋首整理资料之时，

一场关于“浙江有无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战热热闹闹地开始了，唇枪舌剑双方的代表人物都参加了古荡遗址的发掘。一方是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主任胡行之，他在分析了石器的用途以及石器和玉器的关系后，根据与浙江出土石器“相伴出土之物，只有玉器、刻纹陶片而无彩陶、土陶及其他更古之物”的现象，提出“江南一带新石器时代未必有人类居住之可能，那末这些石器也只能看做金石并用时期的物品……时代也只可推定到周末为止，而似不能再为提高了”。针锋相对的另一方则为吴越史地研究会总干事卫聚贤，他笔锋凌厉地回击了胡行之的诘问，坚持浙江有新石器的观点，并认为胡行之以博物馆历史部主任的地位，发表《浙江果有新石器时代文化乎？》这样的文章尤为不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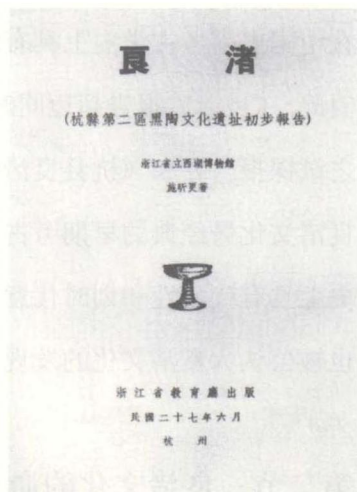
论战的双方都与施昕更有着亲密友好的关系。胡行之是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主任、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发掘报告的校阅者，而卫聚贤则是施昕更研究上的鼓励者、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校后记”的作者，两位知名学者素来为施昕更所敬重，因此发生在两人之间的激烈争论必然对年青的施昕更产生重大影响。在先后发表的《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和《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中，施昕更没有像《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那样直截了当地采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标题，而采取“远古文化遗址”和“黑陶文化遗址”这般隐晦的定性，避免了矛盾，却也

丝毫不隐瞒自己对于良渚黑陶文化的年代认识：“从其本身的文化特质上看来，是与山东城子崖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那是无可疑义的”，“浙江古代已孕育很早的文化，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这是无可疑的了”。如果说古荡遗址由于出土器物太少而不能对其文化性质和年代定性的话，良渚一带遗址中黑陶文化层的发现则充分肯定了这些遗址的古老性和原始性，足以使人们相信早在“夏少康封越，周太伯奔吴”之前，江浙地区就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存在，从而轰动全国。1937年4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董作宾、梁思永两位先生前往良渚实地考察，对施昕更的考古新发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赏。

随后，在当时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等人的支持下，施昕更日以继夜地对考古发掘获得的大批黑陶和石器实物资料进行了细致认真的室内整理，约用半年的时间，写成了5万余字并配有线图及多幅照片的考古发掘报告——《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但由于日寇的入侵，这部报告的印刷出版“经历了许多患难困苦的历程”。杭州失守后，《良渚》报告在杭印刷的字版及锌制图版，在形势危急中均无法携出，在随同西湖博物馆迁徙流亡途中，施昕更以满腔的热情和惊人的意志，重新整理旧稿，经馆长董聿茂先生奔走，得到浙江省教育厅经费支助，至1938年终由上海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

施昕更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共分绪言、遗址、地层、遗物、结语五章，将遗址发现的经过、

各遗址地层堆积的情况、出土遗物、年代与文化性质分析以及编写出版报告的过程等各方面内容都一一翔实记录在案，较完整系统、实事求是地整理记录下了他在良渚镇一带三次田野考古试掘和调查的成果，而且，对以“良渚”作为遗址的定名也作出了说明：“最新的考



《良渚》封面

古报告都以地名为名……我也来仿效一下，遗址因为都在杭县良渚镇附近，名之良渚，也颇适当……所以决定采用这二个字，有名实兼收之妙。”《良渚》报告踏实的学风对整个良渚文化的考古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来为考古学界所推崇，“无论是他在良渚一带的调查、发掘，还是他在艰苦条件下完成的《良渚》报告，即使现在看来还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但它是科学史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的工作，才被载入史册……正因为施先生立足点高，他短暂的一生中唯一的田野考古——良渚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成为东南地区考古史上的里程碑”（王明达先生语）。“如果说古荡出土石器太少而且试掘有限不能对它的文化性质定性的话，那么良渚黑陶文化层的发现则充分肯定了它的原始性和复杂性。施昕更认为它与城子崖龙山文化属于一个文化系统，是确切无疑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从而第一次准确无误地向学术界展示了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

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陈星灿先生语）。因此，《良渚》报告超迈同时期的《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成为江浙地区良渚文化最经典的早期考古发掘报告，并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代表性和划时代意义的考古报告之一，而施昕更先生也被公认为良渚文化的发现者。

第二节 良渚文化的命名

良渚文化发现之初，当时在黄河流域已建立起了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与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东西对峙的学说。在传播论与黄河中心论旧史观的影响下，发现于良渚一带以黑陶为特征的文化自然也被归入龙山文化的范畴，施昕更在《良渚》报告里指出：“从其本身的文化特质上看来，是与山东城子崖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那是无可疑义的。”1937年至1949年间，虽然抗日战争和内战的连年战祸，太湖流域的田野考古工作也像全国一样被迫中止，但研究工作并未停滞。1939年，梁启超之子、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通过全面研究，将全国已发现的以黑陶为特点的龙山文化划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区，并指出以良渚遗址为代表的杭州湾区龙山文化“显示出不可忽视的确定的地域差异”，这一见解首度强调了杭州湾地区史前文化的地域独特性。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江浙地区的考古工作很快得到恢复，一大批有志于文物考古工作的年轻学子，被陆续充实